

# 玉文化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

贺云翱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

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我们不能用今天“珠宝玉器”的观念看待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时代的玉器。那个时期,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发挥着美化身体、沟通人神、建构秩序、象征权力、祭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财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对玉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考古学研究。

## 第一,玉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产生最早、最具有普遍认同的精神文化。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它以玉器的出现为代表。早期的玉器原料多为“美石”,如绿松石、萤石等,成品有玦、璜、环、珠等。相关考古学文化包括北方地区的查海文化、新乐文化、黄河及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后李文化、长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高庙文化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玉器视为“装饰品”,而应看到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为“灵物”,既与远古“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也是中国玉器文化产生的原始“基因”。玉本身可以“通灵”,用玉制成的器物即为“灵物”,它可以摄取各种生物的“灵气”给予人体,也可以让人与天地之灵相沟通。这种“萨满式”的信仰,满足了远古人们的“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玉质的晶莹剔透、坚致细腻、温婉内敛,把“通灵”的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其宝藏于山水之中,可遇而不可求,其稀缺性更加强了它的神秘性和高贵性,在东亚人经历了百万年的石器时代进化积累之后,当人们的精神世界鸿蒙初开,其神圣的宗教情感需要一种“灵物”作为载体和符号时,“美玉”就应时而现,登上了中华玉文化的神坛,并且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精神贡献。也正是因为玉及玉器所具有的这种神圣性文化基因,遂导致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崇拜玉文化的族群,玉的通灵、辟邪、比德、君子如玉、黄金有价玉无价等古老的价值观审美观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当代。我们只要读读曹雪芹的《红楼梦》,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生悲剧中即可体察到那块“通灵宝玉”的无比妙用。

大约到了6000~5000年前左右,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器文化。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陆续实现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拥有精美的系列玉制“礼器”,包括陕西走廊、青藏高原及新疆地区都出现了史前玉器。5000多年前,昆仑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已成为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玉器原料,此后齐家文化使用“和田玉”的比例更高;3000多年前,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贵用材中也有了“和田玉”。可以认为,5000年前左右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如“玉文化”这样能够覆盖今天整个的华夏大地,塑造了一个宏大族群最早也是最广泛的文化选择、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和文化认同。

## 第二,中国玉文化的物质载体“玉器”,从产生时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渐向“制度文明”的载体演化,成为政治文明符号——礼器,最终还被儒家人士转化为“比德于玉”的社会哲学层面的精神文明理念。

许多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郭大顺、邓聪、邓淑萍、高大伦、郑光、刘国祥、张敬国、魏京武、刘斌、方向明等都研究过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玉器的不同文明要素含义,特别是其中的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仰韶文化玉器、屈家岭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石峁文化玉器等,认为它们展现了早期社会权贵或统治者对玉材以及制玉技术、玉器生产和使用权力的独占,使得玉器真正成为文明起源与形成期的重要文明符号,成为政权、神权、族权、军权、财权、男权的重要代表性象征。从良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特征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周礼·春官·大司农》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尽管还值得讨论,但至少其中涉及的大多数玉礼器早在良渚文明时期已经出现,此后又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的政治文化发展到顶点。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据张宏明先生研究,先秦文献中的《诗经》《论语》《春秋左传》《管子》《墨子》《韩非子》《山海经》等记录着大量有关玉文化内容。东周一西汉成书的《礼记·聘义》中记载着孔子最详细的“以德比玉”之说:“……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出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自此,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历程,这种将玉器哲学化的成果进而广泛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玉文化才真正站上人类文明的高峰。

## 第三,中国玉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阶段性特质的重要科学资料。

对“玉文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以深刻影响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就广泛引起学者的关注,许多先秦文献中出现有关玉器的记载和评说即为明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谈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即把中国远古及上古时代历史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个发展时期,这不仅与1819年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的史前时代经历过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多出一个“玉兵”时代。当然,汤姆森的“三期说”是就生产工具演进而论,而东汉学者的“四期说”是从“兵”器演进角度而论,前者重经济,后者重政治,但无论如何,这启发了我国当代一些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了中国“玉器时代”之说。郭大顺先生指出,玉器作为最早出现的礼器之一,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高大伦先生等认为,从玉器看华夏文明的趋向正好发生在炎、黄号令天下之诸侯,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李学勤先生则提出,“玉器”是中国国家产生之后与典章制度和礼仪性建筑相关联的专门的礼仪器物即“礼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玉器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就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一系列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其存在的“玉文化—玉礼器—玉文明”体系及其对后世夏、商、周、汉文明的深刻影响,亦足可说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统确实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因此,玉文化考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

综合地看,玉和玉器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艺术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文化化等过程,构成了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而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个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具体表现及其原因,这又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且极重要的学术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 主题宣传

活动策划 刘国祥 冯朝晖 郭晓蓉  
总顾问 柳士发 李让 李学良  
王巍 陈星灿 赵辉

# 中华文明探源

#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要重视边疆地区

陈伟驹

农业是文明的根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我国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万年前。到了距今9000~8000年,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在同一时期,其他地区诸如东北部和华南地区虽然也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反映定居的房子和墓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要素,但是未见明显的农业迹象,当地先民仍然从事渔猎采集经济。因此,在距今6000~5000年以大型中心性聚落、规模较大的墓葬为代表的文明起源因素和距今5000~3800年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大墓为代表的文明正式形成的标志性遗存恰好仅出现在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区域内。由于上述原因,目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北至辽河、南至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范围。

在我国的王朝历史时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夏、商、周三个最早的王朝文明都出现在这个区域。这一历史现象使得考古和历史学界长期认为,在史前时期中原地区也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其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表明,辽河流域、淮河流域、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与文明起源时间上以及史前各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上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在特定阶段还要超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得益于其地理中心的优势,成为周边地区优秀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地,最终在史前的最后阶段(距今4000年前后)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文明——夏。这就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目前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时强调中原及其外围区域即建立在这种新的文明起源观之上。

这种超越王朝历史、长时段、追根溯源的历史研究视角是考古学研究的优势。但是,距今9000~8000年农业村落的出现并非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最早源头。因为农业村落的出现是建立在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和农业四大新石器文化要素的基础上的,这几个要素的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到距今20000年前。换言之,在农业村落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长达万年以上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阶段或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正如最早的王朝文明所在的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最早出现农业村落的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也并非新石器文化要素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

比如中国的南方地区,最早的磨制石器、陶器、野生稻利用出现于武夷山脉—南岭山脉为中轴的华南地区,而非长江中下游平原。如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青塘黄岩门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岩遗址等,这些遗址出现了距今20000年前后甚至更早的磨制石器、陶器和野生稻利用。这些重要的技术与生计革新是随后(距今9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平原能够产生定居农业村落的重要支撑。再如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最早的磨制石器(磨盘、磨棒)出现在黄河中游一带,如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和沁水下川遗址,但是目前最早的陶器却出现在东北北部的三江平原一带,如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伊春市的桃山和桦阳遗址,其年代在距今15000年以上。目前华北地区的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和马鞍山遗址的陶器虽然也能早到距今15000年,但是这两个遗址位于华北最北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陶器的出现都落在距今12000~9000年间,如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怀柔区转年遗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山东沂源县扁扁洞遗址、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和许昌市灵井遗址。而且华北地区距今9000年以上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与东北北部最早陶器一致,有学者认为华北地区最早陶器的起源是由东北北部南传的结果。此外,东北北部地区的小南山遗址还发现了距今15000年前后的暗示定居的房址。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在农业村落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这一核心区域,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如陶器、定居、谷物采集等甚至早于后者,整体上呈现一种由外向中心传播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甚至可以说是新石器文化要素起源阶段的中心区域。这种现象与文明起源阶段,辽河、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优秀文化向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汇聚的历史趋势有异曲同工之处。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农业的出现,而农业出现的基础则是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和定居。如果要追根溯源,文明的起源终究离不开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和定居这四大新石器文化要素。从这层意义上讲,以中国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为代表的边疆地区,虽然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外围,但是却是“底层”。

即便在距今9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农业村落建立初期,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渔猎采集群体的文化发展水平也不低,也创造出对后来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贡献的文化因素。比如,三江平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在距今9000年左右发展起来比较完整的玉器文化,这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较为系统玉器文化。南岭—湘西一带的高庙文化,在距今7500~7000年创造出我国最早的白陶、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样以及背后相应的宗教信仰系统。玉器由北向南传播,凤鸟纹和兽面纹由南向北传播,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汇聚融合,成就了良渚文化精神信仰和权力控制的符号工具——玉琮和玉钺,为良渚文明的诞生贡献了重要作用。这种以鸟、兽纹样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系统后来还成为龙山时代—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现象,我们目前的初步解释是,与各地的自然环境有关。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大多与末次盛冰期(距今26000~19000年)以来的“广谱革命”有关。所谓的“广谱革命”,指的是人类为了应对末次盛冰期大幅度降温造成的气候和资源压力,不得不拓宽食物来源,捕猎和采集以往不利用或较少利用的小型动物、小型植物或草本谷物和鱼类、贝类等水生动物资源。在距今20000年前后,华南地区率先采集野生水稻、大量采集水生贝类,应该与当地在气温大幅度下降的环境下仍然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陶器、磨制石器等的出现也与这种新的经济背景有关。东北北部虽然地处寒冷地区,但是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当地人群据此可以发展起相对定居的渔猎采集生活,陶器也是为了适应这种经济而出现。由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生资源,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距今9000年以后并没有发展起农业文化,而是延续此前的渔猎采集经济。在辽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业村落建立初期,这些早期农业群体并没有取得绝对的文化优势,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渔猎采集人群仍然能创造出被核心地区农业人群吸收的玉器和复杂鸟兽纹文化等优秀的文化因素。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成熟,农业人群相对于渔猎采集人群的文化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在距今6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大型聚落、较大规模墓葬、高水平的手工业产品,文明起源的步伐明显加速,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逐渐成为文明的边缘地区。到了距今4000年以后,中原地区取得文明发展的中心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文明——夏以后,辽河、黄河下游、淮河、长江中下游也逐渐成为文明中心的外围地带,而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则彻底成了“外围的外围”,以至于其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的“底层”地位被逐渐遗忘。

上述历史现象表明,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中,中华大地上文化发展中心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且不断转移的。在早期王朝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黄河下游沿海一带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曾被称作蛮夷之地,但是在距今6000~4000年间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却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之一;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王朝历史时期和距今9000年以来是农业和文明发展的边疆地区,但是在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约距今20000~9000年)乃至农业村落建立初期(约距今9000~7000年),却创造出对农业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至关重要物质载体,如陶器、玉器和鸟兽纹饰。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颗扎根深厚、根系繁多的大树,那么上述历史现象足以说明中华文明的根系是遍布中华大地的各个区域的。要系统地、深入地系统地阐述中华文明起源,需要全面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地区的历史贡献。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空间范围,把时间焦点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可以更完整地揭示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考古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新石器文化起源的中西理论比较”21@WTK009阶段性成果)